

前 言

宋诗是我国古代诗史上继唐之后而崛起的又一艺术峰峦。宋人在难以企及的唐诗高峰面前，不甘却步，奋力开拓，承唐学唐而变唐，从而使古典诗歌展现了新姿容，开辟了新境域，形成了有异于唐音的一代诗风。自宋以降诗坛上宗唐主宋之争衡，唐音宋调之对举，正可以说明唐宋两代诗歌，俨有双峰并峙，各擅胜场之势。宋代诗坛名家辈出，流派如林，而苏轼、黄庭坚尤为领袖一代的诗家巨星。诗界苏、黄并称由来已久，晁说之靖康初题黄鲁直《尝新柑帖》即云：“元祐末，有苏、黄之称。”（《嵩山文集》卷十八）惠洪诗亦有“苏黄一时顿有，风流千载追还”之句（《石门文字禅》卷十四）。明初宋濂《答章秀才论诗书》谓：“元祐之间，苏黄挺出，虽曰共师李、杜，而竞以己意相高，而诸作又废矣。自此以后，诗人迭起，或波澜富而句律疏，或锻炼精而情性远，大抵不出于二家。”（《宋学士全集》卷二十八）前人论宋诗的鼎盛多标举元祐，而元祐诗坛及其后学诸人又不出齐名一时的苏、黄二家范围，足见宋代诗苑中的苏、黄，是与李、杜两家在唐诗中的地位相当的。

苏轼（1037—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他是人们公认的文学天才、全才，于诗、词、文、赋均有极诣，而其诗歌艺术，则卓然堪称一代之大观。苏轼幼承家学，读书蜀中，仁宗嘉祐初出川应举，受到欧阳修识拔，中进士后又考中制科，开始释褐步入仕途。熙宁初神宗皇帝支持王安石推行新法，苏轼上书反对王安石的变法方案，主张实行稳步渐进的

改革。由于意见不被采纳，请求离京外调。熙宁十年间，他先后任杭州、密州、徐州地方官，曾于任内相机改革时弊，“因法便民”，多有善政。这期间偶或观察到新法推行中的流弊，“不敢默视”，时时“缘诗人之意，托事以讽”（《东坡先生墓志铭》）。不料王安石罢相后，某些新派官僚从苏轼诗文中摘取语句恶意上纲，指控他“包藏祸心”，诽谤君上，因而于元丰二年（1079）他刚到知湖州任不久，便身陷囹圄，险些遭惹了杀身之祸。这次“乌台诗案”文字狱结案后，苏轼被编管黄州。四五年的负罪谪居，他躬耕东坡，疾病困窘，虽被迫闭门思过，但并未缄口搁笔。元丰八年神宗病死，次年改元元祐（1086）继位的哲宗年幼，高太后临朝，起用司马光执政，苏轼奉调回京，升迁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司马光一反熙宁新政，全盘罢废新法，苏轼则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辩试馆职策问札子》），这又引起旧派疑忌。不久司马光病死，旧派分化，朝内斗争激烈，苏轼要求补外，元祐四年出知杭州。后一度召还。有人又从苏轼诗作中罗织罪名进行诬告。苏轼辩明事实后坚乞外任，先后被派知颍州、扬州、定州。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章惇等用事，打起绍述熙、丰的旗号，专门打击报复元祐朝的旧臣，苏轼一月之内三次降官，最后被远贬到惠州（今属广东），三年后又放逐到海南儋州（今海南省儋县）。苏轼以衰迈之年，被赶到当时极为荒僻的岭南，度过了七年流放生涯，直到徽宗即位始奉命内迁，建中靖国元年（1101），在辗转北上的途中，病死于常州。

苏轼的一生是得失波动很大的一生，是仕路巉岩的一生，也是诗才垒涌，任情咏啸的一生。他的诗作今存两千七百多首，艺术意蕴异常丰富。《麓堂诗话》谈到前代诗格简古、内容受限，谓“赖杜诗一出，乃稍为开扩，庶几可尽天下之情

事。韩一衍之，苏再衍之，于是情与事无不可尽”。从苏诗内容的涵盖力说，确乎在杜、韩诗的基础上又有所展衍。苏轼用诗悯农、议政、讽喻、纪游、写景、抒怀、谈艺、题画、诙谐……一切人间物事、喜笑怒骂，无不任情挥洒，舞鼓于笔端。故《津南诗话》谓：“东坡，文中龙也，理妙万物，气吞九州，纵横奔放，若游戏然，莫可测其端倪。”这很能说明苏诗内容的纵放宏阔。

苏轼的社会政事诗，如《渔蛮子》、《石炭》、《秧马歌》、《游博罗香积寺》、《荔支叹》等，或写前人很少触及的题材，或反映某种新出现的事物，都对现实生活有所开拓。东坡以浓厚的兴致和多彩的文笔，摹写祖国的名山异水、胜景伟观，给我们留下了大宗异样出色的景物诗。蜀中山川、长江三峡、钱塘姿容、岭表风物、海南奇妙景观……无不在东坡诗中留下了千姿百态、令人难忘的艺术影像。他长于写动景、奇景、幻景，并且注入环境物象以浓情深致，使笔底意象浮动著壮浪超迈、傲兀旷放的气度，体现出创作主体特有的襟怀个性。《巫山》、《望湖楼晚景》、《白水山佛迹岩》、《行琼儋间肩輿坐睡梦中得句》等，都是这方面的名篇。苏轼历经升沉播迁，对人情冷暖，世路坎壈，体味殊深，惯于在写景纪游中融入身世感喟，寄托生活反思，有时升华到社会人生或物理的宏观哲理，使诗篇贯注了睿智的光彩和活泼的机趣。如《和子由澠池怀旧》，提出了行迹无定、遗踪易泯的偌大人生课题；《东坡》、《慈湖夹阻风》诗，寄托了对世路曲折、人间旅程坎壈的感喟；《泛颍》、《百步洪》诗，在纪游中融入了对世态人情的评判；《又送郑户曹》、《题西林壁》诗，体现出诗人昂首天外、超拔时空局限的遐想和哲思。苏轼于晚年忧患余生，寄寓岭海，写了百余首“和陶诗”，力求追步陶诗的形式和风调来表现

自我性灵。这组诗以平淡浑朴的语言，流露了自身坦然处穷、矫首傲世、委心任天的襟怀和情趣，不时全涌出深蕴自身甘苦、人生哲理的诗思：“坎坷识天意，淹留见人情”，“穷鱼守故沼，聚沫犹相依”，“人间无正味，美好出艰难”云云，颇可视为意味隽永的生活格言。苏轼精通翰墨技艺，于书画别有会心，集中题画诗，多有精品佳什。如《王维吴道子画》品评佛像墨竹，笔势奇纵；《韩干马十四匹》描写群马神态，章法精妙；《惠崇春江晓景》题咏戏鸭、归雁，生机盎然；《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题写长卷画意，奇情幻景，纷呈迭出，烟云舒卷，出神入化。东坡题画诗，不仅使人“见诗如见画”，还长于宣出画面韵、画中神和画外意，且能触景生发，寄寓胸臆，信笔倾洒。苏轼广于交游，笃于友情，敏于酬赠，所作赠和诗，如《和董传留别》、《和晁同年九日见寄》、《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赠王子直秀才》等，或同情士人的清苦境遇，或倾诉襟怀抱负，或扬揄友人高洁品格，诗人真诚敦厚的友情倾溢纸背。

苏诗才思横溢，触处生春，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在诗史上可说是李、杜而后的又一艺术奇峰。

苏诗笔锋精锐，语言爽利，无论抒怀写景、体情咏物，均能意到笔随，巨细必达。如《百步洪》之写泉水湍急，《游径山》之写山势回旋，《新滩》之写鱼鸟情态，《庆源宣义王丈》之写人物性格等等，无不抉别人微，明快透底。即以写世态人情这种较为空灵的客体而论，作者也惯于向深层掘进，化隐为显。如写被劾论罪的心有余悸：“怛然悸痛心不舒，坐起有如挂钩鱼。”（《夜梦》）写旧时争名逐利的衰坏世风：“共见利欲饮食事，各有爪牙头角争。争时怒发霹雳火，险处直在嵌岩坑。人伪相加有余怨，天真丧尽无纯诚。”（《赠陈守道》）真是口快笔

锐，入木三分，“一滚说尽无余意”（朱熹语）。正如赵翼所云：“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瓯北诗话》）多淋漓痛快之语，而少蕴藉含蓄之致，是苏诗异于唐诗的一个特点。《峴傭说诗》云：“东坡才思甚大，而有好尽之病”，当即此意。

苏诗想象飞驰，奇趣横生，意境灵动，比喻新颖巧妙，层出不穷。“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由视觉环境迅即转化出香美的味觉嗅觉形象：“桑畴雨过罗纨腻，麦垅风来饼饵香”（《南园》），从桑田麦垅的风雨立时联想起收获时劳动产品的喜人；“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芽生竹石”（《郭祥正家醉画竹石》）把无形的酒助诗兴的创作灵感，写成可诉诸视觉和触觉的具体物象，诗思敏捷过人，天机洋溢。再如写客居中感伤节序，惋惜光阴、怀想亲旧的落莫心境：“寒鸡知将晨，饥鹤知夜半。亦如老病客，遇节尝感叹。光阴等敲石，过眼不容玩。亲友如搏沙，放手还复散。”（《二公再和亦再答之》）诗中用一系列的生动比喻描述内心的多种感受，喻体和被喻的事物既是复杂的，又是随处可见的日常现象，初看平淡无奇，细味意趣深长。

苏轼发展了韩愈以文为诗的传统，笔力纵横驰骋，议论滔滔汨汨，再加他精熟坟典，胸有洪炉，语汇浩博，典实宏富，故左旋右抽，无不如志，称心挥洒，自成创格。古体长篇每能烟云卷舒，变幻无常。如《王维吴道子画》、《百步洪》、《送李公恕赴阙》、《寄吴德仁兼陈季常》、《送杨杰》等，都写得浑转浏亮，酣恣淋漓，常常行文中忽从天外插来一段不测之境，为寻常胸臆中所无，大有“天马行空”之势。

东坡虽娴熟古今各体，但亦不无短长。大致精于古体，尤以七古最优，五古亦有精神饱满、才气盈涌或以禅理见胜者。

七律逊于七古，风调多洒脱流丽，以气格胜。七绝精美明快，不乏脍炙人口的佳篇。唯对五言近体染指较少。方回《瀛奎律髓》选录苏诗七律四十首，五律仅取一首。施补华说：“东坡最长于七古，沉雄不如杜，而奔放过之；秀逸不如李，而超旷似之；又有文学以济其才。有宋三百年无敌手也。”（《岷峨说诗》）许印芳谓：“东坡天才豪放，学殖富有，发为文章，非大篇长句不足供其挥洒。故其诗七言最为擅场，七古较七律尤为出色，七律虽不及七古，而气格超胜。”（《律髓辑要》）这些均为公允持平之论。

苏诗新而能变，机趣洋溢，间有奇笔异想，而风格基调是清雄奔放，驰纵自如并兼有清逸简淡。尤为出色的是：苏诗风神出自天然自得，而不假人力雕镌。赵翼比较诗史三大家谓：“李诗如高云之游空。杜诗如乔岳之矗天。苏诗如流水之行地。”苏诗独绝之处，“在乎心地空明，自然流出，一似全不着力。”而自然意味悠长。（《瓠北诗语》）。

东坡诗是宋代诗史上的一座奇峰，山谷诗则堪称足与苏诗卓然并峙的宋诗的最为典型的代表。宋代文林有一个良好的风气，就是名家宿儒乐于以文会友，揄扬后学，“先后进相汲引”，识拔长养一批才士。钱惟演之于洛中诗人集团，范仲淹、欧阳修之于嘉祐文苑高才，苏轼之于元祐词林，无不如此。苏轼发扬了前辈学人的优良传统，把汲引培植后进视为莫大乐事，因而一时名世之才多出于苏门，在苏门弟子中，黄庭坚的诗歌成就最为杰出，时人奉为诗坛宗匠、江西诗派开山。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生于宋洪州府分宁（今江西修水县）高城乡双井里。其家世代业儒，父黄庶诗学杜甫，“雄奇峭拔”、“意境一新”（《伐檀集》跋）。舅父李常（字公择）富于藏书，博学能诗。黄庭坚元配孙氏早逝，曾

续娶谢氏，他的两位岳父孙觉（字莘老）、谢景初（字师厚），都是学杜的诗人，黄庭坚的诗才曾经得到他们的启迪。

山谷自幼颖悟，勤于攻读，博闻强记，文才出众。英宗治平四年（1067）中进士后，调汝州叶县（今属河南）尉。从此走入仕途。神宗熙宁五年（1072）参加学官考试，以文章优等，除北京（今河北大名）国子监教授，留任七年。元丰三年（1080）改任吉州太和（今属江西）知县。三年后移监德州德平镇（今山东商河境内）。神宗病逝，以秘书省校书部召回汴京。哲宗元祐初，被任命为实录检讨官，主持编写《神宗实录》，后就试学士院，同张耒、晁补之并擢馆职，开始了六七年的馆阁生涯。哲宗亲政，章惇、蔡卞等人当权，黄庭坚被加上编纂实录“诬毁”先朝的罪名，责授涪州（今四川涪陵）别驾、黔州（今四川彭水）安置，后又移贬戎州（今四川宜宾市）。徽宗即位，黄庭坚离戎东归，小驻荆州（今湖北江陵县），获诏准领太平州（今安徽当涂）事，到任九天即被罢职。崇宁二年（1103）蔡京等人大兴党祸，黄庭坚被视为“元祐奸党”，再次远贬宜州（今广西宜山）。诗人流落宜州一年有余，便在困顿折磨之中离开了人世。

黄庭坚的宦海升沉大体上是与苏轼的仕途祸福相关联的。苏、黄不仅有很深的翰墨交谊，而且在政治态度上也是颇为相近的。黄庭坚比苏轼小十岁，熙宁五年苏轼于湖州会晤孙觉时曾在坐席间见到黄庭坚的诗文，熙宁十年苏轼由潍州赴徐州时又曾在济南李常处进一步了解了黄庭坚的人品和文章。元丰元年黄庭坚曾致书苏轼并附《古风》二首，表达对苏轼的仰慕之情，苏轼复函揄扬并次韵酬和，两位诗人从此订交。黄庭坚二十三岁跻身官场，熙宁元丰时期，主要任州县官和地方学官，这阶段他注意了解下层民隐，也目睹新法推行中的某些弊端，

但并未公开表示意见，故尚未卷入政争漩涡。元祐时期他与苏轼等人同时升擢，长期任职馆阁，成为以苏轼为中心的元祐文人群体的重要成员，同元祐臣僚时有过往酬唱，结下了翰墨情缘，留下了文坛佳话，这是山谷一生的荣幸，但荣幸中也潜伏着某种不幸。由于黄庭坚与苏轼等人的师友交谊，绍圣、崇宁时期，黄庭坚被列入元祐党籍受尽章惇、蔡京等人的迫害，连续贬斥远窜荒服。五十岁以后，即山谷一生的最后十年，他身陷逆境，备受折困，颠沛流离，病死异乡。同苏轼一样，诗人的暮年也是充满悲剧的。

黄庭坚论诗力主独创。他有“文章最忌随人后”（《赠谢敞，王博喻》）、“自成一家始逼真”（《题乐毅诗后》）的名言，他一再宣称“着鞭莫落人后”（《再用前韵赠子勉》）、“我不为牛后人”（《赠高子勉》）。诗人认为，“文章本心术，万古无辙迹”（《寄晁元忠十首》其五），作者应自出机杼，各抒其怀。以故作品的风调应因人而异，各有独诣，“声随器形异，安可一律调？”（《几复读庄子戏赠》）正说明这个道理。

切记尘俗是黄庭坚诗学的又一主张。在《书嵇叔夜诗与侄本夏》中他说：“叔夜此诗豪壮清丽，无一点尘俗气。凡学作诗者不可不成诵在心，想见其人。虽沉于世故者，暂而揽其余芳，便可扑去面上三斗俗尘矣。……士生于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或问不俗之状，余曰：难言也。视其平居，无以异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这是作者论诗的重要标准。诗人的“不俗”，不是表面上“异于俗人”，而是要在大事上秉持风节，所谓“秉不凋之节，奉以终始”（《与王子飞》）。山谷的所谓“不凋之节”，当然无非是儒者出处、进退、忧国、临民之风范，尤其洪炎所说“远声利，薄轩冕”一类，更是山谷所钦仰的高风特操，这当然不超出儒家传

统道德范畴，但它毕竟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儒林正气的体现。诗人具有这种心胸和修养，诗歌才有超尘拔俗的远韵。这就是《再次韵兼简履中南玉》诗中所说的“句中稍觉道战胜，胸次不使俗尘生”。

为了独创和脱俗，黄庭坚很看重诗人的学养。他认为作者的学养是诗文的根柢。对学养他经常强调养性、读书两个方面。他讲“治经之法，不独玩其文章，谈说义理而已，一言一句，皆以养心治性”（《书赠韩琼秀才》）。他告诫别人“文章乃其粉泽，要须探其根本，本固则世故之风雨不能飘摇”（《与徐甥师川》）、“生珠之水砂砾润，生玉之山草木荣”（《走笔答明略适尧民来相约》）。这些比喻无不是强调作家的自我修养的重要。作文根柢养性修身而外，山谷特看重读书。认为“所作其未至者，探经术未深，读老杜、李白、韩退之诗不熟耳。”（《与徐师川书》）。在《论作诗文》中也说：“词意高胜要从学问中来尔。”黄庭坚打过一个比喻：“岷山之水滥觞，及其成江，横绝吴楚，涵受百谷，以深其源本故也。学而知本者，盖可以求师友于书册矣。”（《与元聿圣庚书》）

在具备学养的基础上，黄庭坚还为写诗者昭示了具体门径。即讲求法度和诗艺。他提出“作文字须摹古人，百工之技，亦无有不法而成者”（《论作诗文》）。规模古人，目的在于“领略古法生新奇”（《次韵子瞻和子由观韩干马，因论伯时画天马》）。黄庭坚讲诗法比王安石益加细密化、体系化。他讲究章法，提出“文章必谨布置”（《潜溪诗眼》）、“作诗正如作杂剧，初时布置，临了须打诨，方是出场”（《王直方诗话》）。对句法、字法他讲得更多。他赞人“用字稳实，句法刻厉而有和气”（《跋雷太简圣俞诗》）、“所寄诗醇淡而有句法”（《答何静翁书》），还常说自己从某前辈得句法云云。黄庭坚还总结出一些

创作技法，“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是最为有名的两条。撮其要旨，“夺胎换骨”，侧重于诗意诗境的因旧生新，“点铁成金”主要指语言上的继承点化。

一般地说黄庭坚并不忽视诗歌的社会功能。他赞成文章要“规摹远大，必有为而后作”（《王定国文集序》），也曾吟过“文章不经世，风期南山露”（《寄晁元忠十首》其十）、“文章功用不经世，何异丝窠缀露珠”（《戏呈孔毅父》）一类强调文学功能的诗句。不过他不赞成用诗歌讥刺政治，认为诗歌的作用，不在“强谏争于廷，怨忿诉于道”，他把用诗“强谏”、“忿诉”，比为“怒邻骂座”，说东坡的短处“在好骂”。他提倡用诗陶写性情、薰染读者，“诗者，人之性情”，然而性情要加以陶洗、净化，做到遇物悲喜，“发于呻吟调笑之声，胸次释然，而闻者亦有所劝勉”。他把“末世诗人之言”比为“候虫之声”，要做到“无怨之怨”（《书王知载胸山杂咏后》、《胡宗元诗集序》）。这就是说他不赞同诗歌直接刺世的战斗作用，而看重诗歌娱悦性情、陶写襟怀、潜移默化的薰沐功能，作者倘有怨愤，也要规范于含蓄委婉的限度之内。黄氏的主张有利于发展诗歌的美感魅力。亦明显地刻烙着北宋末期党争日炽、诗祸日剧的衰乱时代的印记。

黄庭坚现存诗歌约一千九百余首。最值得注意的有两部分诗作。其一，直接涉及现实的；其二，侧重表现自我的。

黄庭坚赞同文章经世，自然必须干预现实。他不是漠视现实的诗人，并不象前人说：黄豫章“与世味少缘”，“真有凭虚欲仙之意，此人似一生未尝食烟火食者”（《荆川先生集·书黄山谷诗后》）。其实，细按其诗集，山谷何尝如此超然。他早年做叶县尉时，就写过反映人民苦难的《流民叹》。元丰中做太和令时，诗人目睹下层百姓的疾苦，感同身受，慷慨内疚，发

出了“民病我亦病”的感叹，表达了“年丰村落罢追胥”（《次韵寅庵》）、“要使鰥寡无嗷呻”（《赠送张叔和》）的愿望。在《虎号南山》中，他把贪吏暴政比成猛虎，在《送刘士彦赴福建转运判官》中，提醒对方“维闽七聚落，独困吏饕”，在《寄李次翁》中，特意标举他“不以民为梯，俯仰无所作”的良好风操。在《送顾子敦赴河东》中，诗人谆谆嘱咐：“上党地寒应强饮，两河民病要分忧。犹闻昔在军兴日，一马人间费十牛。”这意味深长的诗句，贯注着诗人关心现实、体恤民隐的深情。北宋国力虚弱，西北面临辽夏威胁，御敌防边始终是许多进步作家关注的社会课题，黄庭坚也不例外。《次韵游景叔闻洮河捷报寄诸将四首》、《和游景叔月报三捷》等诗，热情地表彰边将的战功。在《送范德孺知庆州》、《次韵奉答吉邻机宜》中，诗人还以昂奋的激情，勉励负有守边责任的友人，为巩固疆防做出贡献。山谷的爱国诗是富有气势和热情的，如“幄中已断匈奴臂，军前可饮月氏头。愿见呼韩朝渭上，诸将不用万户侯。”表示了对安定边塞、消弭战争的展望，贯注着压倒强敌的气势，字里行间洋溢着关怀国事的热情。洪炎《豫章黄先生退厅堂录序》说：山谷诗“极其致忧国爱民，忠义之气蔼然见于笔墨之外。”他以诗的语言对现实政局发表过许多很有价值的见解。他在《送徐景道尉武宁》诗中说：“当官莫避事，为吏要清心。”从对别人的期望中，也反映了作者自身积极的济时行志的精神。北宋后期，党争激烈，官场倾陷成风，时局仓皇反复，一派得势，就要把另一派踩在脚下，山谷虽然也被卷入旋涡，吃了不少苦头，但他却能超脱门户之见，比较客观地看待问题。元祐初期旧派不顾一切地排斥新党。山谷在《次韵子由绩溪病起》诗中，提出了“人材包新旧，王度济宽猛”的见解，奉劝执政者参考新政之长，“兼用熙丰人材”。元祐三年，友人曹

辅出任福建路转运判官，山谷临别赠言，也特别提醒对方到地方要重视发现人材：“百城阅人如阅马，泛架亦要知才难。盐车之下有绝足，败群勿纵为民残。”（《送曹子方福建路运判》）元符三年徽宗继位，山谷在《再作答徐无隐》诗中又说：“开纳倾万方，皇极运九畴。闭奸有要道，新旧随才收。”这种破除成见广开才路的好意见，在《病起荆江亭即事》中也有鲜明的表述。山谷政治上升沉，同元祐旧僚连结在一起，旧派在新政废止后，对王安石攻击不遗余力，山谷却在《次韵王荆公题西太一宫壁》、《有怀半山老人再次韵》、《奉和文潜赠无咎》等诗中，对王氏的人品和新学给予很高的评价。在为政的问题上，山谷无论自律或劝人，都念念不忘体恤下层百姓的疾苦。如说：“官宁惮淹留，职在拊嫠嫠。”（《丙辰仍宿清泉寺》）“定知与民乐，吏瘦吾民肥。”（《寄题安福李令适轩》）他绝不肯用牺牲百姓的利益来换取个人升迁，只要与民有利，宁可让官府吏员多受些劳苦。在封建时代的上层人士中，能够有这种襟怀，委实是难能可贵的。元祐中期，变法形势发生了全盘逆变，当权者热中于争权和倾轧，旧党内部分裂成各种派系，宋朝政局岌岌可危。黄庭坚以曲折的笔法表达了自己对形势的隐忧：“洪福僧园拂绀纱，旧题尘壁似昏鸦。春残已是风和雨，更著游人撼落花！”（《同元明过洪福寺戏题》）这些都足以说明，黄庭坚的诗歌并不是和现实政治绝缘的。

然而，直接干预现实的诗作，无论从数量或反映生活的深度说，在山谷诗歌成就中，毕竟不占主要地位。而写得最为出色、最有个性、最足代表其艺术成就的，恰是着重于表现自我、从侧面反映客观生活的那一部分个人抒情诗。从这部分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黄庭坚明达的识度，坚定的操守，一反尘俗的襟怀，爱悦自然的雅趣，笃于情谊的醇厚性灵……。黄庭

坚重视人格、操守，主张加深内在修养，以期达到人格的自我完善。他所强调的修养功夫，主要是以道役物而不为物役。他在诗中一再表达这种意向。如“丈夫存远大，胸次要落落”（《次韵杨明叔见钱》）；“心随物作宰，人谓我非夫”；“决定不是物，方名大丈夫”（《次韵杨明叔》）；“道应无蒂芥，学应尽工夫”（《再次韵》）等等。以此，黄氏的个人抒情诗，多体现出人格的狷洁。如《次韵杨明叔见钱》其二：“杨君清渭水，自流浊泾中。今年贫到骨，豪气似元龙。男儿生世间，笔端吐白虹。何事与秋萤，争光蒲苇丛。”元符三年山谷自戎州贬所东归，门生杨明叔写诗饯行，山谷次韵答和。诗中激励对方出污泥而不染，处贫贱而气豪，奋笔立言，羞与屑小争利。这虽是望人，也正体现了作者的人格理想。再如：“十年不见犹如此，未觉斯人叹滞留。白璧明珠多按剑，浊泾清渭要同流。日晴花色自深浅，风软鸟声相应酬。谈笑一樽非俗物，对公无地可言愁。”（《闰月访同年李夷伯子真于河上，子真以诗谢，次韵》）这诗在赞人中，体现了作者明达的识度和洁身自律的处世哲学。《题胡逸老致虚庵》也是这方面诗作的代表：“藏书万卷可教子，遗金满赢常作灾。能与贫人共年谷，必有明月生蚌胎。山随宴坐图画出，水作夜窗风雨来。观山观水皆得妙，更将何物污灵台。”诗中饱含哲理，训世警迷，有发人深省之效。诗人力反尘俗，自然倾心于“观山观水”的高情雅趣，因而他的个人抒情诗常常与动人的景观美结合在一起，如《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二首》在刻划岳阳楼的优美景观中，抒发了自己于远放后脱险东归的欣幸情怀，《登快阁》写太和邑政之暇，登县东快阁所见旷远的江天胜景，同时透露了作者对摆脱官务羁绊的向往。其颈联：“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以眼界辽阔、笔力苍劲著称，成为写景名句。诗人对世俗名利表示淡

薄，但对于亲朋的情谊却十分醇厚。他写了不少怀念友人的名作。如《寄黄几复》、《次韵几复和答所寄》、《过平舆怀李子先》、《次元明韵寄子由》等。《次元明韵寄子由》云：“半世交亲随流水，几人图画入凌烟？春风春雨花经眼，江南江北水拍天。欲解铜章行问道，定知石友许忘年。脊令各有思归恨，日月相催雪满颠。”这首诗以感喟人生过半、功业未立入题，兼写朋友兄弟之情，念亲、怀友、思归的心绪糅和在一起，“石友忘年”、“脊令各有”，既见出诗人与苏轼兄弟的纯真友谊，又写出山谷与苏辙两家兄弟间的手足深情，是语言精警而意蕴丰厚的抒情佳篇。黄庭坚性情笃厚，“于亲旧间，上承下逮，一以恩意为主”（李之仪《姑溪居士文集·跋山谷帖》）。故诗作中有些写兄弟、亲属、家人之情的，大都纯朴真挚、亲切可读。如《赣上食莲有感》，用一系列的联想和比喻，写慈母之爱和兄弟手足之情亲。元丰六年移家德平途经分宁所写的《过家》，以细腻的文笔，描述闾里人事的变迁，寄寓了诗人对家乡和亲故的深沉眷念。元祐三年写的《嘲小德》真切地刻画了小德学语学字的娇憨情态，体现了诗人对幼儿由衷的喜爱。《和答元明黔南赠别》是山谷在黔州为赠别护送自己到贬所的长兄元明而作的：“万里相看忘逆旅，三声清泪落离觞。朝云往日攀天梦，夜雨何时对榻凉。急雪脊令相并影，惊风鸿雁不成行。归舟天际常回首，从此频书慰断肠。”这诗从暂时相聚，写到举杯送别，从共渡巫山，说到何时联床夜话，并以风雪中的脊令、鸿雁，比况形影相依的兄弟俩即将分袂远别，天各一方。清冷的意境，凄凉的格调，烘染出老兄弟俩患难与共、依依不舍的手足深情。读来是颇为感人的。

黄庭坚诗在内容上自有其特色，但相比之下，艺术上的新创尤为突出。山谷论文反对“随人作计”，主张“自成一家”，他

的诗成功地达到了这一目标。他是继苏轼之后能够更出新意，一洗唐调”的杰出代表。当年“东坡先生以为一代之法，当推鲁直”（黄庭坚《与王周彦书》）。山谷诗的艺术独创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其一，富有思致机趣，耐人寻绎回味。前人已指出：“黄山谷、陈后山专寓深远趣味。”（谢尧臣《张于湖先生集序》）这些深远诗趣，不可能来自抽象说教，山谷善于即景宣情，托物寄意，借鲜明的形象，寓深邃的哲思。如《寺斋睡起二首》：“小黠大痴螳捕蝉，有余不足夔怜蚘。退食归来北窗梦，一江风月趁渔船。”“桃李无言一再风，黄鹂惟见绿匆匆。人言九事八为律，倘有江船吾欲东。”前首借物写人，以动物世界的智愚相角、多寡相忌来隐喻尘世的恶浊，进而引出梦思归隐，寄寓了个人超轶尘俗的人生观感。后者以自然风物象征政治气候，感叹桃李为风折困，春事将尽，好景不长，暗示自己要洁身远引。元祐四年旧党内部分化，刚直的苏轼受到攻击，不容于朝。这些诗篇隐约地流露了山谷对政局的忧念。再如六言诗《蚊蝶图》：“胡蝶双飞得意，偶然毕命网罗。群蚁争收坠翼，策勋归去南柯。”这诗写于崇宁初年蔡京等人加剧报复元祐旧臣时期，作者借题画描写了一幕把得意升迁建立在他人触网失败的畸形社会关系图景，体现了诗人对险恶现实的厌憎。诗中无一字主观评论，而倾向性全由形象画面中自然宣出。据《程史》说这首诗传至京师，曾引起蔡京的震怒，足见它的批判力量，是不难为人察知的。黄庭坚的许多诗篇，同写一景、一物、一事的作品不同，而往往能对某种现实、社会和人生的独特感受，作更高层次的艺术升华和概括，因而含有幽渺的思致和深沉的哲理。读来往往会感到言近旨远，意味无穷。

其二，章法细密，线索深藏，转折急陡，起结无端。山谷

诗讲究章法布置，而布置惯于曲折变化，绝无常套定式，故而读来自然超出寻常滑俗蹊径。如《谢公定作竟陵主簿》：“谢公文章如虎豹，至今斑斑在儿孙。竟陵主簿极多闻，万事不理专讨论。涧松无心古须鬣，天球不琢中粹温。落笔尘沙百马奔，剧谈风霆九河翻。胸中恢疏无怨恩，当官持廉庭不烦。吏民欺公亦可忍，慎勿惊鱼使水浑。汉滨耆旧今谁存，驷马高盖徒纷纷。安知四海习凿齿，拄笏看度南山云？”全诗以先世文采泽被儿孙领起，以下“万事不理”、“涧松无心”、“天球不琢”、“百马奔”、“九河翻”云云，奇崛的意象，看似杂然并涌，毫不联属，其实“万事不理”正说明专力文章，“涧松”、“天球”以喻风度品格，“百马”、“九河”以喻文笔、谈锋，无不是由首联而来。即使是短篇小诗，山谷也力求章法跌宕，避免平直，如：“朝廷无事君臣乐，花柳多情殿阁春。不觉胡雏心暗动，绮罗翻作坠楼人。”（《和陈君仪读太真外传其四》）前联渲染出一派承平宴乐、春景和煦的气象，三句陡转，由胡雏心动，一下推出绮罗坠楼的历史悲剧，气氛骤变，形势急转直下，仅四句诗概括了李唐由盛而衰的时代转换。方东树《昭昧詹言》云：“山谷之妙，起无端，接无端，大笔如椽，转折如龙虎，扫弃一切，独提精要之语，每每承接处，中亘万里，不相联属，非寻常意计所及。”确能道出黄诗章法的精妙。

其三，讲究句法、字法，长于点化锻造，下语奇警，引人惊异。黄庭坚论诗惯谈句法，如称陈履常“作诗渊源得老杜句法”（《答王子飞书》）。他自己写诗更注重句法烹炼。刘埙称山谷“时作律诗，亦自有一种句法”（《隐居通议》卷八）。黄诗句法特点主要是笔力挺健，意象奇警，严整中有流走之势。《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体……》诗，硬语险韵，节奏拗峭，意象奇特，是被誉为“奇健之气，拂拂意表”的名篇。不少

律句也多为人称道。如：“家徒四壁书侵坐，马瘦三山叶拥门。”（《次韵宋楸宗猷居甘泉坊雪后书怀》）“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寄黄几复》）“已回青眼追鸿翼，肯使黄尘没马头。”（《赠李辅圣》）全用新颖不俗的生动意象来表现，句子由精心选拣、恰当组合的名词或词组来构成，浓缩而警拔，处处显示出诗人锻句之精妙。

黄庭坚诗尤讲究下字、用事，所谓“用一事如军中之令，置一字如关门之键。”（《跋高子勉诗》）下字千锤百炼，一丝不苟，如《送舅氏野夫之宣城》诗，希望李莘到任后，宣城日有起色，因有句云：“晚楼明宛水，春骑簇昭亭，秔稌丰圩户，桁杨卧讼庭。”这里着“明”、“簇”、“丰”、“卧”四字，就生动地显示出宣城的环境优美，城市繁荣，百姓富足，诉讼稀少。再如“心犹未死杯中物，春不能朱镜里颜”（《次韵柳通叟寄王文通》），把内动词“死”用如外动词，把形容词“朱”用作动词，镌刻深沉地写出了年华虽老而嗜酒不歇。“诗人昼吟山人座，醉客夜愕江撼床”（《题落星寺》）；着一“人”字，写出山岳之迫近寺斋，着一“撼”字，写出江涛之人耳惊梦。陈师道谓“句中有眼黄别驾”，黄诗句中之眼，增强了句式的警拔力和生动性。

山谷惯于独出心裁地熔铸典故，点石化金。如“寻师访道鱼千里，盖世功名黍一炊”（《王稚川既到都下有所盼未归》）；“愚知相悬三十里，荣枯同有百余年”（《寄怀公寿》）。诗人化用《关尹子》和《枕中记》的掌故来组成工整的偶句。“鱼千里”与“黍一炊”；仅三个字就各概括了一个故事，极为警策地分别状述了求学的勤苦和求名的无谓。智愚之别，本不能以空间距离计算，但据《世说新语》载，曹操对杨修承认：“我才不及卿乃三十里”，作者取来融化入诗，与“百余年”组成工对，使人感到新巧异常。